

透视西方传播权力转移的背后

赵强

是合理的。美国玩这种“双重标准”不奇怪,美国三大网络巨头在政客面前俯首帖耳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一向以“新闻自由”旗手自居的美国,为什么这次连戴上“新闻自由”的面具做样子都无暇顾及,而是直接赤膊上阵,拿俄罗斯媒体以及自己的网络媒体开刀?西方国家一直标榜的“新闻自由”正面临来自实践的质疑。

权力转移:资本垄断话语权正遭遇挑战

在涉及言论自由和媒体管控问题时,西方国家总是会祭出“新闻自由”的大杀器来占据“道义制高点”。这一次,美国宁愿自扇耳光也要痛下杀手,除了其在舆论上自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更在于西方传播权力已经发生深刻转移。传统媒体时代,自由竞争的市场法则使西方新闻业不可避免地走向垄断,西方标榜的所谓“独立媒体”,其越来越掌控在极少数人手里。《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被视为全球最有权势的媒体,在世界新闻业界可谓举足轻重,在国际传播领域可以呼风唤雨。但是,站在它们背后的却是几个不为公众熟知的家族和巨富。资本家为了保护手中的资本、获取更多的利润,必然要运用资本赋予的传播权力,在舆论上自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搞清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这三者的关系,就能发现西方国家舆论操控的内在动力和实施路径。

扯下面具:“新闻自由”已无暇顾及

从“颜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美国借“新闻自由”之名,在操控舆论、干涉他国大选问题上从来都不会手软。例如,在2009年伊朗大选引发的混乱中,美国国务院官员发电邮给推特,肯定其在伊朗政治动荡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建议”推特延迟原定的系统维护时间,以免影响街头的抗议者们相互联络。推特公司按要求作出相应调整,尽管事后否认是出于官方授意。2017年底,伊朗爆发反政府抗议行动,西方情报机构故伎重演,在社交媒体上伪造木偶账号,散布虚假信息。如今,当美国自己面临来自社交媒体的反噬、遭遇“假新闻”冲击时,立刻摆出坚壁清野的架势,甚至还控诉别国干涉其内政。英国《金融时报》也刊文嘲讽脸书,指其已沦为“一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广告机器,被俄罗斯用以影响美国大选”。

面对外来的渗透和干预,当非西方国家保持警惕、发出警示的时候,西方政客和媒体就高高举起“新闻自由”的大旗,宣称媒体应该遵循新闻专业主义、摒弃国家利益标准,政府任何试图管控媒体的行为都是无耻的、不可容忍的;当非西方国家采取行动打击境外势力舆论渗透时,他们又抹黑这种做法是“民族主义”的“病态幻觉”,是在打压“民主自由”。现在,面对同样的问题,当美国自己出手管控媒体时,一切又都

准空子“乘虚而入”了,美国因此开始着急。这是一个原因。还要看到,在过去,由于地理和技术上的屏障作用以及传统媒体“把关人”的存在,恶意的政治信息“入侵”是有难度的。但是,数字化虚拟空间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国家安全疆界,击碎了诸多物理层面的区隔,使舆论渗透更为便利。一些占据传播优势的西方国家或组织,可以通过数字通道传播其价值观,甚至肆意诋毁、攻击他国政治制度,达到干涉他国内政的目的。尽管在传统媒体时代他们就已经这么干了,但是现在更加便捷、更有效力。这当中,美国无疑处于强势地位。

不过,这样的便利是一把“双刃剑”,别人在你面前门户大开的時候,你也一样面临被别人“反噬”的风险。以全球用户为基础的社交媒体,让欧美精英们越来越感到难以控制和主导。脸书2017年第四季度日活跃用户达到14亿,月活跃用户更是高达21.3亿。这样一种量级,远非传统媒体可比。更为重要的是,脸书平台上美国用户大约为2.4亿,整体占比只有11%。也就是说,将近90%的用户来自美国之外。美国能不着急?

前不久美国媒体曝出,5000万美国脸书用户信息被英国“剑桥分析”公司获取,用以建立分析模型,精确向用户推送“定制信息”甚至是假信息,从而帮助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5000万人接近脸书美国活跃用户总数的1/3、美国选民总人数的1/4。从欧盟和美国官方的反应来看,较之用户信息泄露,如此众多的社交媒体用户在不知不觉中因政治目的被实施了技术操控,才是更为恐怖的事情。尽管脸书CEO扎克伯格已经为此公开道歉,但是大家都明白,不论是欧美官方,还是脸书公司,都没有驾驭社交媒体的能力和自信。传播权力转移,带来的是政治上的焦虑与恐惧。所以,美国这次无暇顾及“新闻自由”的面具,以本国建制派认定的国家利益为标尺,斩钉截铁地对媒体痛下杀手。

深层问题:西方“普世价值”的陨落

在西方社会,“新闻自由”被宣称为“普遍的”“全民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天赋人权”。“新闻自由”思想的流布与实践,在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完成,“新闻自由”在西方社会不断嬗变。西方媒体自诩为“第四力量”,自认为是传播真相、维护公正的“无冕之王”,但是实践却不断消解这样的道义存在感。“新闻自由”一方面继续在“普世价值”的名义下被大力鼓吹,成为西方社会在价值领域自我标榜的一块“金字招牌”;另一方面则被资本与权力绑架、滥用,成为它们对内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外进行“民主干预”的幌子。

维基解密、“棱镜门”这些事件几乎把美国“新闻自由”的遮羞布撕得粉

碎,但是没有看出美国为此羞愧。现在出现了所谓的“通俄门”,美国政客和媒体纷纷群起揭批,似乎这种事情只有俄罗斯才会干,欧美国家俨然从未干过。更为恶劣的潜在逻辑是,这种事情只能是欧美国家对其他国家干,其他国家除了逆来顺受,不应也不能做出任何回击。

这暴露出另一个深层次问题:从过去在道义层面颐指气使,到现在拉下脸来赤膊上阵,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着什么?

长久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以民主斗士、自由勇士、人权卫士自居,对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西方引以为傲的价值观进行了大量脱离现实、超越实际的宣示和输出。举凡“民主”,就必须是全民普选、三权分立,否则就是伪民主,不管你的民主模式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更有效率、是否更能代表民意;举凡“新闻自由”,就必须是“私人办报”“独立媒体”,否则就是宣传机器,就是罔顾民意;甚至言及人权,也抱着“何不食肉糜”的高傲姿态,质问那些民不聊生、生存权堪忧的国家,为什么不保证国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有甚者,直接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入侵他国。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西方的“民主攻势”进行得顺风顺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和挑战。这一方面是因为,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价值观在抽象层面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攫取了更多利益,奠定了繁荣基础。那么,到底是民主、自由、人权推动了西方社会的繁荣,还是西方社会的繁荣为其民主、自由、人权提供了物质前提?实践给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和答案。今天,人们已经发现,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并不能带来社会的繁荣,西方社会的繁荣也不是依靠其民主、自由、人权,而是依靠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靠对其他国家的剥夺。

当前,政治极化导致治理困境,两党恶斗频现财政悬崖,老牌政党组阁艰难,民粹主义泛滥,极右政党坐大,分裂主义抬头……西方国家正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使其在抽象层面讨论民主、自由、人权时的傲慢,被现实冲击得越来越没有底气。其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刻变化,逐渐削弱了西方国家用过去那种巧取豪夺的方式支付其民主制度成本的能力。

作为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国正在一次次展示“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自私与霸道。特朗普上台以来,先后宣布退出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些举动引发了包括其传统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不满,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总体而言,西方国家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传统观念上越来越进退失据,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不再有能力像过去那样把“双重标准”包装得富丽堂皇,于是索性撕破脸皮。这应该是美国一连串举动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环球时报社副总编辑)



一直以来,中美经贸问题都是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当前,中美经贸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美国不仅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而且挥舞301调查“大棒”,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正当的投资并购。美国上述做法,明显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不仅会将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拖入贸易战,损人不利己,而且将给全球贸易秩序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损害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美国应该深刻认识到,作为发达国家和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大要有大的样子,应当负起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不能自己国内出现问题却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自己得病却让别的国家甚至世界人民吃药。

推动中美经贸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中美两国利益,中美之间巨额贸易往来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实现了互惠互利。同时,由于中国出口美国的大部分商品是物美价廉的日用消费品,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降低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对美国中低收入人群是十分有利的。据测算,2015年,仅从中国进口日用品一项就为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节省了2850美元的花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中美在投资领域日益成为重要伙伴。截至2016年底,中国大陆企业对美投资存量达到605.8亿美元。

对华贸易逆差,是美国对中国产生不满并在经贸问题上频繁搞小动作的主要原因。其实,美国应当冷静、客观地认清其对华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源,找准症结所在,而后开好药方。应该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源不在别人,而在美国自身。首先,长期以来,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美国将众多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把研发中心和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留在本国。这种经济结构使美国稳居全球价值链高端,成为全球利润分配中的最大获利者,同时也必然催生美国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物美价廉商品的旺盛需求,很多贸易逆差由此产生。多年来,美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经济布局,既赚取了巨额利润,又尽情消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大量物美价廉商品,可以说是占尽便宜。现在,美国却忽然认为这成了问题,而且不怪自己却怪别人,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其逻辑实在匪夷所思,其做法显然不能治好自已的“病”。其次,美国的统计方法存在很大问题。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笔记本电脑等商品,很多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子公司生产的,大部分利润已被美国公司赚取,却要按整个商品的报关价格统计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里,这显然夸大了贸易逆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既然美国不喜欢对华贸易逆差,那就应当自己发展低端制造业,通过自主生产满足本国需求;同时,多向中国出口中国需要的高科技产品,冲销贸易逆差。但美国的做法却是在诸多高科技领域采取对华限制出口政策。自己需要的商品不愿意生产,别人需要的商品又不肯卖,怎么可能没有贸易逆差呢?

认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源就可以知道,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其实很简单:美国应根据国内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多生产本国人民需要的产品以减少进口;同时,放开对中国等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扩大出口。不理智地强迫别国与自己打贸易战,并非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的有效途径。

中美两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互为举足轻重的经贸伙伴,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发生贸易战必然两败俱伤,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应改变不理性的做法,遵循国际贸易规则,坚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问题,与中国一道担当起大国责任。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根源在其自身

周世俭

西部地区应用好自身文化资源

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文化发展

杨建毅

历史上,古老的丝绸之路曾为促进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作出过重大贡献。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几年来,“一带一路”从倡议变为实践,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影响力和号召力不断增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文化发展之路,将极大推动相关国家文化交流。我国西部地区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地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充分用好自身文化资源,促进文化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尤其是沿线各国由于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历史背景不同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绚丽斑斓的文化,“一带一路”犹如一条丝带把各种文化串联起来。我国地域辽阔,文化丰富多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当既着眼于经济发展,又着眼于文化交流,推动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共同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我国西部地区逐步从开放末梢变为开放前沿,开放发展空间广阔。西部地区自然条件较差,不少地方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影响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导致西部地区文化的影响力有限。三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西部地区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发展面临财力物力不足难题,影响了对一些文化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新形势下,西部地区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

设带来的机遇,用好文化资源,促进文化发展。创新文化发展理念。西部地区的干部群众要解放思想,深刻认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要深刻认识文化产业具有低投入、低消耗的特点,在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转型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作用。只有创新文化发展理念,才能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让西部地区的文化走出去、传开来,从而更好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激发文化发展活力。西部地区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促进文化发展,需要在内外结合中激发文化发展活力。一方面,要摸清理清本地区的文化资源,进行科学评估,使文化发展牢牢立足本地区的文化发展实际;另一方面,要以开放包容的文化不断学习、引进其他地区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引进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只有内外结合,才能不断提升文化发展水平。

培育和发展文化产业。“一带一路”建设为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西部地区应深入分析自身文化优势,了解“一带一路”参与国人民的文化需求,以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为着力点,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完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应在创作、生产、传播等各个环节下功夫,推出更多更好个性化、大众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作者为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规模化 集约化 专业化

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特征

晏晓东

在传统发展模式下,我国文化资源配置受行政区划限制,地方保护、产业壁垒问题比较突出,文化企业较难形成自己的产业价值链。随着文化旅游、影视制作、动漫游戏和广告传媒等新兴产业异军突起,这些中间和地地方文化企业融合发展。中央文化企业可以通过参股、控股等形式加强对地方文化资源的整合,努力打造文化企业航母。

实行集约化经营。集约化是指文化产业在做大同时也要做强,即在实现规模化效应的基础上使文化资源

的配置和利用达到最优状态,实现高产、高效、优质的目标。集约化倡导效益最大化,强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一直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存在战略规划宏大而实现路径模糊以及生产成本高、附加值低等问题。从长远看,过度依靠资源投入来实现发展,必然会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因此,实行集约化经营,不仅是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还是提高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首先,应健全文化产权制度。产权保护状况直接影响文化产业集约化经营水平。应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文化产权的内涵和保护范围,加大保护力度。同时,健全文化产权的信息发布制度和定价机制。其次,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科技创新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高新技术与文化融合而衍生的新的文化产业发展形态,不仅代表着文化产业发展方向,而且能为文化企业集约化

经营提供动力、拓展路径。

实现专业化发展。专业化意味着文化产业在做大做强时还要做优。这就需要文化企业深耕某一领域,需要一些地区重点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当前,从世界范围看,追求技术上的领先和企业的专业化发展是文化企业兼并重组的内生动力。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并开始走向国门、走向世界。然而,真正具备竞争力的特色文化产业和企业并不多,一些文化企业缺少文化创意、习惯盲目跟风,产品同质化严重,经营专业化程度低。实现专业化发展,一要因地制宜找准特色定位,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积极打造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二要重视人才、重视科技,鼓励以知识产权、技术要素等入股文化产业。同时,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为优秀人才提供创作空间。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国民之魂,文以化之。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图腾,一个国家的标识,更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核心支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我国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近年来,为了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文化产业兼并重组势头强劲,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特征。

追求规模化效应。当前,云计算、移动互联、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不断涌现,悄然改变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文化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仅仅局限于规模大小,还包括产业价值链竞争。因此,所谓规模化,不仅是培育龙头企业,而且要形成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打造自己主导的产业价值链。

